

移民与方言认同

周振鹤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上海 200433)

摘要

人群的认同方式有多种标准。最普通的是两种, 其一是血缘关系, 这是以种族与家族来体现的; 其二是地缘关系, 这是以居住地域的同一性, 通俗地说即是以同乡关系来认知的; 其实还有第三种, 即文化关系, 以同一文化为维系群体的基础。这三种关系有时一致, 有时并不一致, 甚至互相交叉, 甚至产生矛盾, 前南斯拉夫地区的流血冲突与这三种关系的纠缠密切相关。血缘认同是人类最早的认同方式, 这就是由家庭进而到家族再进而到氏族再进而到种族的认同。在中国, 谱牒的修撰与祠堂的设置原来只是皇家的特权, 中古以后下降到大臣仕宦之家, 宋以后更下到底民, 于是建祠堂、撰宗谱, 成为血缘认同的最重要手段, 归宗认祖就是血缘认同的表现, 大姓还通过联谱的手段, 将同宗的范围不断扩大。由于同宗就是同姓, 因此除了义子、入赘与改姓等特殊情况下, 同一姓氏的家族之间总存在血缘关系。引伸开来, 就是“五百年前是一家”, “一笔写不出两个王字”这种说法。因此由姓氏的调查有时也能代替遗传研究方面的采样问题。

中国有两千年以上的皇权专制的中央集权制的历史, 这一政治制度的特点就是对国家进行地域上的分级管理, 所有的国民都在一定的行政区划中生活, 因此对所在政区非常熟悉, 每一个人一般都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什么地方的人, 同居一处的人便有了同乡的观念, 这个同乡观念就是地缘认同的基础。所以人群的划分就有了南方人北方人, 河北人、山东人、福建人、广东人等等区别, 进而还有保定人、无锡人、福州人的不同, 甚至于还有厦门人与鼓浪屿人的区别, 东乡人与西乡人的不同, 亦即所谓小同乡与大同乡的不同。当然越是小同乡, 就显得越亲近。老乡见老乡, 两眼泪汪汪, 不但有亲切感而且有互相扶助的义务, 因此过去各地就有同乡会馆的建立, 这种会馆有多种层次, 大的如两浙会馆, 以一省为单位, 中的有以一府为单位的, 如四明会馆, 即宁波府为范围, 小的甚至以一县为对象, 但这种县级会馆多数只设在本省省会。还有数地合为一个会馆的, 如有杭州会馆, 这是杭州一府的, 还有仁钱会馆, 是杭州府附郭两县仁和与钱塘的联合会馆。清代仁钱馆还设到了北京, 这是因为他们有财力的缘故。中小会馆都与方言认同重合, 两地联合的也往往如此。除了省级会馆以外, 不同方言的地方一般不会联合建一个会馆。

不过晚近二三十年以来, 由于人口流动普遍, 异地结婚与远离家乡工作的人增多, 新一代的青年于地缘认同的观念正在淡化之中。因为父母籍贯不同, 女性地位提高, 所生子女已经不全以父亲的籍贯为籍贯, 加之父母在各自籍贯以外地方工作, 子女无论父母那一方的出生地或原籍地均未去过, 这种地缘认同自然要削弱。但总体来讲, 地缘认同在中国目前仍然是重要的认同方式。

文化的认同在中国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学术界所言“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就是视文化认同在血缘认同之上。进而言之, 中国的汉族主要是文化上的意义, 而不是种族上的认同。换句话说, 在汉民族里头其实包含着其他民族的成份, 这些民族因为接受了汉文化, 也就认同为汉族。遗传学研究已经证明南方与北方汉族的源流是有明显差异的。所以

在中国文化认同是很重要的认同标准，至于血缘认同只在小规模的人群，即至多是一个同姓的家族里的认同。但是比较笼统的文化认同只是学术上的说法，一般的人往往觉察不到这一点。一般人最直观的认同还是地缘认同。

但是就在地缘认同之外，中国还有比较特别的方言认同的现象存在，这是文化认同的进一步发展所致，亦即文化认同的细分又有语言认同、宗教认同等区别。由于语言的纷纭与宗教派别的差异，同一语言的人群可以信仰不同的宗教或教派，同一宗教或教派的人群又可能使用不同的语言，因此文化认同的线条较粗，事实上应该细化到语言的认同与宗教的认同。当然文化还应该包括风俗习惯，但这方面的认同较简单，不像语言问题及宗教问题那样敏感。中国的情况比较特殊，宗教观念相对淡薄，不同宗教之间一般不引起重大冲突，语言方面更不存在尖锐的矛盾，但依然存在语言认同，尤其是方言认同的问题。这一点表现得最为明显的是客家人的认同。

上一世纪三十年代，罗香林曾经提出“民系”的概念，就是针对客家人的特殊情况提出来的。因为除了客家人之外，汉民族的其他人基本上都可以以地缘作认同的基础。如福建人广东人江西人的区别十分明显。唯有客家人大部分居住于闽赣粤三省交界之处，又散居于川湘桂台等地，所以难以从地缘方面来规定他们，但他们具有相同的习俗，尤其是具有特别的客方言，只好提出“民系”的概念来。但民系概念一经提出，便似乎不宜专为客家人而设，于是又有人提出其他民系，如粤海系，如福佬系，如瓯海系等。最近陈支平的著作《福建五大民系》就是代表。但仔细分析这些民系，无一不是以方言的认同为基础，一个民系用一种汉语方言或一种方言的次方言。所以事实上，所谓民系只不过是方言认同的不合适的表述而已。因而方言认同实际上与地缘认同有同样的重要性，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尤其对于客家人“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的传统观念看来更是如此，他们正是靠着顽强地维护他们的方言才得以维系他们的认同。

其他人的方言认同也许没有客家人这么强烈，但也同样存在。例如同在闽方言区内，福州人与厦门人就有不一样的认同，因为他们之间方言的差异太大，以至于无法通话。而闽南人与台湾大部分人就有认同感，因为所谓台语无非就是闽南语的地域上的迁移而已。因此台资流向厦门比流向福州自然要多一些。方言认同的重要性虽然很大，但这种认同与地缘认同及血缘认同之间有什么关系一直没有认真的研究。以下想就这个问题做进一步的思考。

汉语方言的形成与分布与中国历史上绵绵不绝的移民活动息息相关。这些移民活动有古代大规模长距离的北方人民的三次南迁，也有规模稍次，但延续时间较长的由东部到西南地区的迁徙，晚近以来还有由大陆向台湾，由关内向东北的时间相对集中，规模不小的迁徙。除此而外，短时间小规模短距离的迁徙活动更是不可胜数。这些移民活动在中国历史上引起了许多重要的文化现象，其中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就是各种汉语方言的形成与发展。现代汉语方言一般说来有官话方言、吴方言、湘方言、粤方言、闽方言、赣方言与客方言等七大方言。官话方言即北方方言，是中原地区古代汉语及其前身数千年来自身的发展并且与北方阿尔泰语系等非汉语语言交融、碰撞的产物。官话方言的次方言之一江淮官话则是西晋永嘉丧乱以后一百五十年间迁移到江淮一带的移民所形成，另一次方言西南官话主要是中唐安史之乱以后的移民所造成。其他六种南方方言的源头则是历史上不同时期迁移到南方的北方移民所带来。其时代可能从先周一直到唐宋之际，但其形成的具体过程

相当复杂，今天还不能完全予以复原。比较明确的是闽方言应是六朝时期从江南一带向福建的移民所形成，赣客方言的共同源头则由中唐安史之乱迁移到江西北部与中部的移民所带来。到唐宋之际，这些移民中的一部分又迁移到赣闽粤交界地区而形成客方言。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除了第一次北南方向的大移民，亦即永嘉丧乱以后北方向南方的移民有相对可靠的数量外，其他移民的数量都比较难以估计。虽然南方的许多地方在唐以前没有得充分的开发，但一般说来，南方仍然有相当数量的原住民，北方移民总要与南方土著发生接触，在语言上也要有所交融。除了在个别地区移民因为占绝对优势而使得移民方言有取代土著方言或语言的可能外，其他地方的移民方言就要与土著方言或语言在交融中发生变迁，这是问题的一方面，是应该由语言学来研究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唐代以前迁往南方的移民在文化方面要高于南方土著。无论生产方式、生活样态还是文化水平都是如此。因此他们所带来的方言也就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可能为当地土著所模仿，甚至成为他们的第二语言，就如同今日普通话的使用范围日益扩大，方言不断萎缩，汉语使用地域不断扩大，少数民族也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一样。更进一步的发展，可能是土著放弃了他们原有的语言而改用移民语言，于是从方言认同看来，他们就是同属一个人群了，或曰同一个“民系”。但这只是推测而已，我希望遗传学者们能对这个问题加以深入的研究，将方言认同与血缘认同之间的关系弄明白。这一研究有很重要的意义，那就是我们不但可以了解文化认同的机能与程度究竟如何，而且还能从根本上探明北方移民的实际规模有多大。其实客家人在赣闽粤地区肯定同化了许多当时的少数民族，但只有从遗传学上的研究才能证明这一点，而且是数量方面的证明。如果可能，我希望历史学者、语言学者与遗传学者能携手从事这一研究。

（上接第 134 页）

参考文献：

- [1] Morrison NA, Qi JC, Tokita A, et al. Prediction of bone density from vitamin D receptor alleles[J]. *Nature*, 1994, 367(6460):284.
- [2] Sambrook J. *Molecular cloning: a laboratory manual* [M]. 3ed. New York: 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 1989:931.
- [3] Garnero P, Borel O, Sornay-Rendu E, et al. Vitamin D receptor gene polymorphisms do not predict bone turnover and bone mass in healthy premenopausal woman[J]. *J Bone Miner Res*, 1995, 10(9):1283.
- [4] Hustmyer FG, De Luca HF, Peacock M, Apa I, BsmI, EcoRV, and Tag I poly-morphisms at the human vitamin D receptor gene locus in Caucasians, Blacks and Asia[J]. *J Clin Invest*, 1994, 94 (10):2130.
- [5] Yamagata Z, Miyamura T, Iijima S, et al. Vitamin D receptor gene polymorphism and bone mineral density in healthy Japanese women[J]. *Lancet*, 1994, 344(8928):1027.
- [6] Lim SK, Park YS, Park JM, et al. Lack of association between vitamin D receptor genotypes and osteoporosis in Koreans[J]. *J Clin Endocrinol Metab*, 1995, 80(12):3677.